

浙东文化研究

(第1辑)

East Zhejiang Cultural Studies

◎ 张 伟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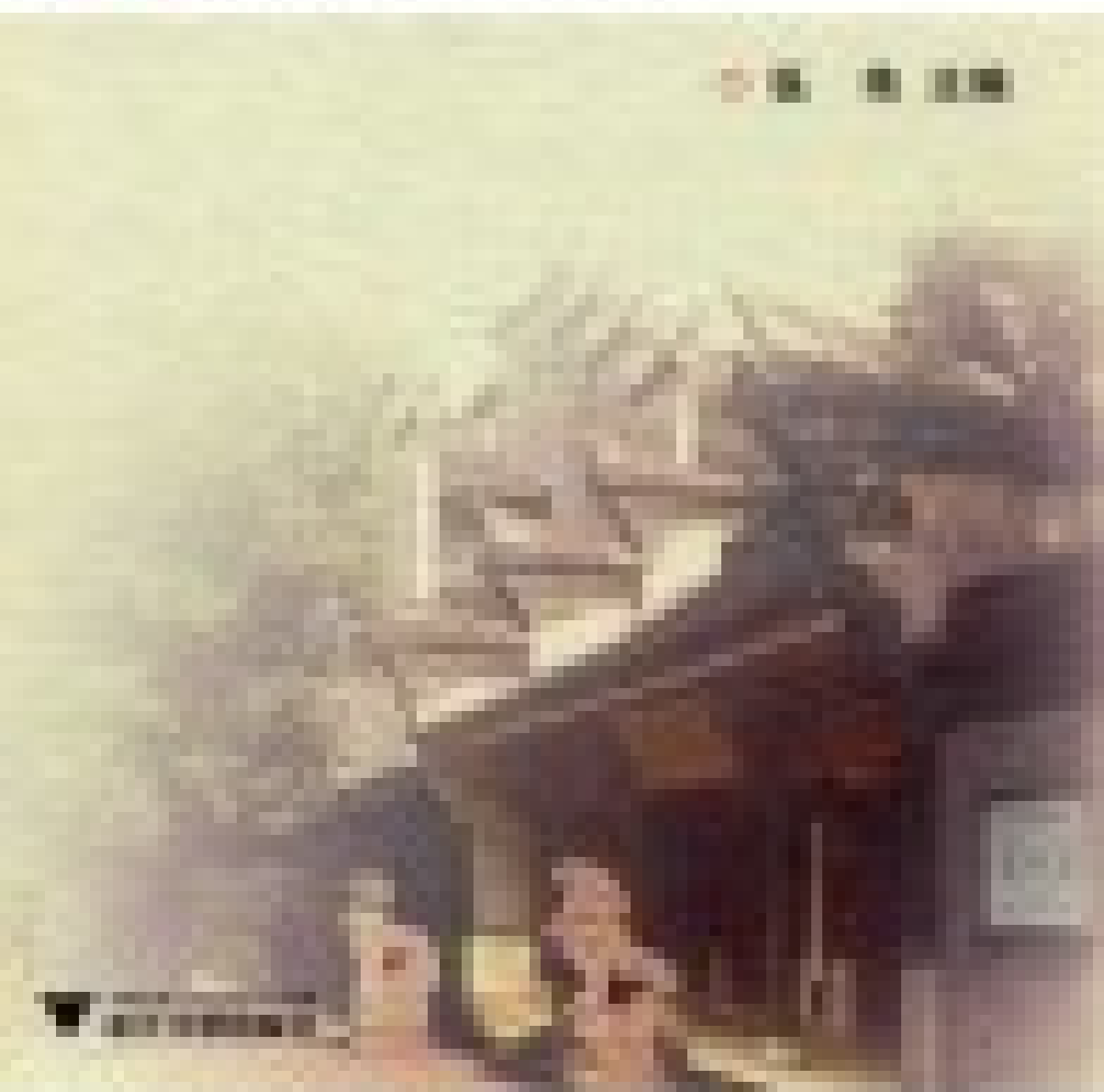


浙东文化研究

【第1輯】

East Zhejiang Cultural Research

卷一



浙东文化研究

East Zhejiang Cultural Studies

(第1辑)

◎ 张 伟 主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东文化研究. 第1辑 / 张伟主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308-13800-0

I. ①浙… II. ①张… III. ①文化史—浙江省—文集
IV. ①K29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4220 号

浙东文化研究(第1辑)

张 伟 主 编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525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800-0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宁波大学浙东文化与海外华人研究院资助出版

前 言

浙东开发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浙东地域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仅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海上丝路文化、佛教文化、藏书文化、商帮文化、青瓷文化和饮食文化等,而且先后涌现出了以王充、吕祖谦、陈亮、叶适、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章学诚等为代表的一批饮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及相关学术流派,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浙东文化是浙江文化的重要构成,对浙东文化进行深入而全面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而且能够为丰富中华文化宝库提供有力支撑。

为了加强学术交流,推动浙东文化研究,2013年12月13—15日,宁波大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宁波大学浙东文化与海外华人研究院、宁波市浙东文化研究基地、浙东文化与宁波文化大市建设研究中心在宁波联合举办了“多维视野下的浙东文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海洋学院、浙江科技学院、湖州师范学院以及中国社科院、浙江省社科院、杭州市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研讨会,本集即为研讨会期间所提交的相关论文的汇编。

本辑共选录论文37篇,研究范围涉及浙东文化的方方面面,我们将之结集出版,以飨广大读者。希冀本论文集的问世,能够对浙东文化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编 者

2014年4月

目 录

宋代科举与南宋浙东学人、学术	何忠礼(001)
庆历五先生:宁波文化坐标的节点	李小红 陈雁(015)
叶适门人孙之宏及其《周礼说》考述	张如安 杨未(022)
“甬上四先生”对象山心学的继承和张大	
——以心本论为中心的考察	范立舟(032)
袁燮的世家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张实龙(052)
简论袁燮的心学成就及贡献	邢舒绪(060)
南宋浙东刻书业的三大类型及其地域特征	唐燮军(069)
浙东礼学述略	程继红(081)
袁桷师事王应麟时间考辨	张骁飞(096)
“前后相维,若脉可寻”	
——南宋与清初浙东学派之比较	孙善根(103)
黄宗羲对刘宗周学术的承继及其师门护持之功	张天杰(113)
浙中王门先驱徐爱、蔡宗兗、朱节合论	
——以黄绾与徐、蔡、朱三先生的交游为中心	张宏敏(124)
论黄宗羲的思想	
——从刘宗周思想的接受到“自得”的重视	丰岛由子 申绪璐(133)
阳明思想中“良知”与“良能”概念关系探究	
——兼论其“意”之分层	贾庆军(146)
晚清黄维煊洋务与学术研究	钱茂伟(159)
黄式三、黄以周《易》学著作序跋述	韩伟表(173)
毛起的《诸子论》及其学术价值	张涅(181)
宁波与日本承和年间遣唐使关系考辨	李广志(189)
日本九州现存的宋风石塔	
——萨摩塔	刘恒武(195)
日本发现监国鲁王与朱舜水敕书真迹的史料价值及现实意义	钱明(202)
万历二十五年的石星、沈惟敬案	
——以新出史料《刑部奏议》为中心	郑洁西(220)



明嘉靖时期浙东倭乱的成因·····	童 杰(229)
论明代象山县志上的地图·····	龚纓晏(239)
道光《浒山志》及其版本·····	童银舫(247)
《余姚六仓志》编纂始末·····	王孙荣(251)
陈亮时文考论·····	闵泽平(260)
元代鄞县诗人袁士元生平事迹考述·····	唐艳芳(273)
论戴表元诗歌中以诗自娱主题·····	杨凤琴(289)
晚明浙东曲家群体创作特征探析·····	张 萍(298)
明末东渡僧人心越诗歌的禅理与画意·····	敖运梅(307)
清初甬上诗社兴盛原因初探·····	戴松岳(315)
手把雕弓挽落晖	
——《续甬上耆旧诗》中的哭张苍水诗·····	龚烈沸(325)
浙东海洋古文献述略·····	张 杰 尔 仁(333)
论陈训正的教育实践及其理念·····	沈松平(341)
论经济因素对浙东作家小说叙事的影响	
——以王鲁彦的乡土小说为例·····	周春英(350)
旅日温州人社会的历史及其演变	
——以唐氏家族史为中心·····	郑乐静(361)
浙东文化创意产业化发展及存在问题研究·····	李海峰(372)

宋代科举与南宋浙东学人、学术

何忠礼

(浙江大学)

摘要:北宋中期,科举制度经过一系列改革以后,正式确立了不讲门第、以成绩好坏作为录取或黜落标准的取士办法,从而为平民子弟通过科举入仕扫清了道路。与此同时,王安石改革科举,进一步加强了经义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和作用,促使应举者将精力由帖经、墨义、诗赋转向对儒家经典内涵的发明和研究上。北宋灭亡后,大批北方移民南下,为浙东地区带来了新的学术空气,同时也使科场竞争更加激烈,一批聪颖的平民子弟,在良好的人文环境下,一方面皓首穷经,或授徒讲学,相互切磋学问,对儒学有了更深入的见解;另一方面通过科举考试跻身仕途,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两者交替发生作用,涌现出了以吕祖谦、陈亮、叶适、杨简、王应麟、黄震等为代表的著名浙东学人,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思想。由此可见,宋代科举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浙东学人,并推动了浙东学术的繁荣。

关键词:南宋 科举 浙东 学人 学术

在南宋立国的一个半世纪里,浙东地区涌现出了大批著名的儒家学者,由此形成了众多学派,就其大者,有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小者则有以王应麟为代表的深宁学派、以黄震为代表的东发学派等,真可谓群星璀璨,相互辉映。要不是宋理宗定理学于一统,对其他诸学派采取压制的政策,特别是元灭南宋后,浙东大地的儒学精英一时散尽,这种类似于“百家争鸣”局面的学术风气,对中国的思想界肯定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论者或问,这些带有显明时代特征的儒家学者也即学人,在南宋浙东大地因何能风雷四起?对此,以前有学者曾对南宋浙东学术的兴起原因作过解释,归纳起来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当时严峻的社会形势,对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二是



“同浙东地区特殊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状况密切相关”^①。另有学者则将上述两个原因具体化为三点：一是浙东自东汉的王充起，就有良好的学术传统；二是南宋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新的学术空气；三是浙东地近南宋都城临安，受民族矛盾的刺激更深。

以上解释，实际上也间接地回答了浙东学人大量涌现的原因。但是，笔者以为，这些解释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并未点出关键之所在，即没有指出浙东学人所以能登上历史舞台的共性，没有指出浙东学人所以能创立各个学派的原因，所以尚不足以令人信服。一是受古代学术思想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浙东地区，可是只有到了南宋，这里才出现如此众多的学人，学术繁荣也更胜于其他地区。二是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对永嘉事功学派似乎有所影响，但对其他学派的影响却并不明显。三是浙东毕竟处于南宋内地，与直接受到女真、蒙古威胁的地区相比，这里的人们谈不上所受刺激最深，也谈不上危机感最为严重。

笔者认为，南宋浙东学人的出身和仕进有其共性，浙东各学派尽管在理论上各有差异，但他们都属于新儒学即宋学的一部分。因此，南宋浙东学人的涌现和学派林立，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其他，而是受到当时科举制度的推动和影响，换言之，是宋代科举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浙东学人，并推动了浙东学术的繁荣。

一、唐宋科举制度的不同

论者或问，科举制度正式形成于唐代，为何要到南宋才会促进浙东地区学人的大量涌现和学术的繁荣？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对唐宋科举制度作一比较。

所谓科举，是指以“投牒自进为主要特征”，以考试成绩好坏为录取与否的标准，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并定期开科取士的制度。科举制度虽然形成于唐代，但当时尚属初创，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流弊，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唐代科举还带着以往察举制的严重弊病。唐代科举，士子首先要在州郡通过考试，取得发解资格，然后赴礼部参加省试，成绩合格后得以成为进士。乍一看，似乎很重视举人考试成绩的高低，实际上却大谬不然。原来唐代科举“兼采誉望”，允许朝廷里的有力者（主要是宰执臣、王公贵族和著名文学之士）向知贡举推荐录取之人，美其名为“公荐”。举人为获取“公荐”，在考试前，须要奔走于这些人的门下，向他们“行卷”“温卷”“求知己”，以得到他们的揄扬和推荐，从而给主考官造成必取的压力，这种情况，就是如著名诗人白居易也不能免。故知贡举“未引试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②，使考试成了一种形式。一些知贡举若拒绝“公荐”，往往会遭到不测之祸。如唐穆宗长庆元年（821），礼部侍郎钱徽出任知贡举，因没有答应宰相段文

① 方如金等：《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② 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五《韩文公荐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标点本，第670页。

昌为杨浑之“求致进士第”的“面托”而被贬黜^①，即为一例。由此可见，举人考试成绩的好坏，在唐代并不能真正成为及第或黜落的主要原因。请托无门、屡试不第的士人，只得发出“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闭户十年专笔砚，仰天无处认梯媒”^②的慨叹，一些才能之士，不能通过科场脱颖而出，只能抱恨终身。

二是考试制度不够严密，造成场屋内外百弊丛生。唐代科举，对被任命为考官之人，不实行锁宿，使他们大有机会接受亲托，泄露题目。试卷既不封弥，更不誊录，考官在评卷时高下其手，易如反掌。在举人方面，唐代科场既无挟书之禁，又可秉烛夜试，替身代考也不乏其人，士子作弊之风盛行。在这种情况下，造成取士不公也就不可避免。

三是帝王很少干预科举取士，知贡举和大官僚、大贵族常常把持取士之权。唐代多数年份的科举，皇帝并未插手干预，知贡举基本上由礼部侍郎出任，举人进退，全出于他之手，致使时人有“礼部侍郎重于宰相”^③之说。当然，知贡举的权力也受到宰执大臣、王公贵族的挑战，为了替子弟亲故窃取科名，他们常常迫使知贡举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史载，玄宗朝权臣杨国忠子暄，“举明经，学业荒陋，不及格。礼部侍郎达奚珣畏国忠权势，遣其子昭应尉抚，先白之。抚伺国忠入朝上马，趋至马下。国忠意其子必中选，有喜色。抚曰：‘大人白相公，郎君所试不中程序，然亦未敢落也。’”企图用讨好的形式征询杨国忠对其子暄落第的态度。不料杨国忠闻言大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贵，乃令鼠辈相卖。”遂策马不顾而去。“抚惶遽，书白其父曰：‘彼恃挟贵势，令人惨嗟，安可复与论曲直？’”达奚珣无奈，只得“置暄上第”。^④又如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礼部侍郎权德舆知贡举，宰相李实“托私荐士”，但权德舆不能完全满足他的要求，李实为此大怒，“遂大录二十人，迫德舆曰：‘可依此第之，不尔，必出外官，悔无及也。’德舆虽不从，然颇惧其诬奏”^⑤。这种视进士为自己囊中物的唐代科举，怎能公平取士可言。

四是重门第，平民子弟很难由科举进身。唐朝建立后，一方面，南北朝以来的士族门阀势力残余尚严重存在；另一方面，又形成了李氏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和以新兴官僚集团为代表的“近代新门”^⑥。因此，政权基本上仍操纵在老士族手中，科举取士也多体现了他们的利益，故士人应举入仕，受到门第的严格限制。唐太宗曾下诏令，文武官限六百四十三员。他对宰相房玄龄说：“朕设此待天下贤士，工商、杂流假使技出等夷，正当厚给以财，不可假以官，与贤者比肩立，同坐食也。”^⑦唐高宗时又规定：

① 事见刘昫《旧唐书》卷一六八《钱徽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4383—4384页。

② 杜荀鹤：《唐风集》卷二《投从叔补阙》诗、《投江上崔尚书》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六九《韦贯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5153页。

④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天宝十一载十月条，中华书局1987年标点本，第6920页。

⑤ 《旧唐书》卷一三五《李实传》，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3731—3732页。

⑥ 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一〇《讨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新唐书》卷一八一《曹确传》，第5352页。



“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①换言之，士人如果有大功（指堂兄弟一辈）以上亲从事工商者，或出身于奴婢、胥吏家庭，就不得应举。对于农家子弟，唐代虽无明文限制，但在史籍中找不到他们应举入仕的影子，因而农民子弟恐怕也被排斥在科举之外。台湾学者毛汉光将新旧《唐书》所载八百三十名进士的社会成分作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进士出身者，士族子弟尤多，高达百分之七十一，而小姓（普通官员）为百分之十三点一，寒素（庶族地主）中进士第者仅占进士总额的百分之十五点九。”^②从中可以了解，唐代大部分进士出身于占人口极少数的士族之家，至于一般平民子弟，则基本上与科举无缘。

可是，由于受到唐末、五代长期战乱的打击，入宋以后，士族门阀势力已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是大官僚还是大地主，依靠门第做官已不可能，只有通过科举才能延续其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生存。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不少物力较为雄厚的富裕农民，有的还上升为中、小地主阶级。工商业者也逐渐摆脱了门第的束缚，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他们都具备了供子弟读书和参加科举的条件。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迫切需要扩大统治基础，以防止世家大族的再起，所以也要尽可能地满足平民子弟科举入仕的愿望。此外，随着北宋统一事业的基本完成，“疆宇至远，吏员益众”^③，也迫切需要人才。这一切，使北宋从立国之后起，有必要也有可能对唐代以来基本上操纵在大官僚、大地主手中的科举制度进行改革。其荦荦大者，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禁止结成座主、门生关系，以防由科举而形成朋党。建隆三年（962）九月，太祖下诏曰：“国家悬科取士，为官择人，既擢第于公朝，宁谢恩于私室？将惩薄俗，宜举明文。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如违，御史台弹奏……不得以只科为贵，兼不得呼春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④宋代录取进士人数远多于唐代，却没有因科举造成的朋党，这项禁令确实起到了很大作用。

第二，严禁朝臣“公荐”举人。按照以往的制度，每岁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举所知有才艺之人，号称“公荐”。太祖“虑其因缘挟私”，^⑤乾德元年（963）九月，遂下诏禁止：“礼部贡举人，自今朝臣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⑥后来，北宋统治者又几次下诏，重申该项禁令，并还“公荐”以本来面目，直指其为“嘱请”。^⑦

① 长孙无忌等：《唐律疏义》卷二五《诈假官假与人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参见卓遵宏《唐代进士与政治》，台湾编译馆1987年版，第16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丙寅条，中华书局2004年点校本，第394页。

④ 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至二，中华书局1957年据前北平图书馆1935年影印本缩小重印本。

⑤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3605页。

⑥ 《长编》卷四，乾德元年九月丙子条，第105页。

⑦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七载：真宗景德元年（1004）九月诏：“令御史台谕馆阁、台省官，有以简札贡举人姓名嘱请者，即密以闻，当加严断。其隐匿不言，因事彰露，亦当重行朝典。”

第三,取消门第限制,无论士、农、工、商,只要被认为是稍具文墨的优秀子弟,皆允许应举入仕。尽管北宋对士人应举也有身份上的限制,如不允许“工商、杂类”参加科举,但事实上仍为这些人留下了很大的应举空间,如太宗淳化三年(992)三月诏书云:

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或举人内有乡里是声教未通之地,许于开封府、河南府寄应。^①

既然“工商、杂类”可以破格应举,那么他们的子弟就更不会有此种限制。难怪到南宋时,任何人只要不冒贯匿服,不触犯刑律,不是残疾之人,皆可应举,甚至以屠牛为业的屠夫,也能发解赴省试。^②这就为平民子弟的应举扫除了门第障碍。

第四,实施殿试和唱名制度,皇帝亲自掌握取士权。皇帝亲自主持礼部所取进士的覆试,谓之科举殿试,亦称廷试、御试。在唐代,殿试虽偶尔行之,但并未形成制度。北宋初年,太祖对内专注于防止武人势力的再起;对外忙于进行统一战争,因而对取士权尚无暇顾及,一切权力仍归有司。太祖后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日趋稳定,遂开始将目光转向取士权问题。开宝五年(972)闰二月,太祖亲自召对新进士于讲武殿,然后下诏发榜,此实为殿试之渐。翌年三月,太祖在召对新进士时,颇觉权知贡举李昉在录取中有私情。正当此时,落第进士徐士廉击登闻鼓,伏阙下求见。太祖当晚召见,士廉诉昉用情,取舍非当,建议举行殿试。^③太祖欣然听取士廉建议,不几天覆试已中、未中进士三百六十人,“得进士二十六人,士廉预焉”^④,此后便将殿试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雍熙二年(985),太宗又定殿前唱名、皇帝亲赐及第之制,使进士真正成了“天子门生”,从而从知贡举手中,夺回了取士大权。

第五,监督和削弱主考官的权力。一是改变知贡举由礼部侍郎出任的规定,而成为皇帝临时任命相应官员兼任的一种差遣,称权知贡举,以防考前请托。又增设权同知贡举一人或数人。后来,不仅权同知贡举有多名,权知贡举也不止一人,目的无非是为了分散他们的权力,防止由少数人操纵科举。二是从太宗淳化三年(992)起,官员一经被任命为主考官后,就禁止他与外界和家人交往,必须立即入院锁宿,以避免请托和泄露试题。大中祥符七年(1014)八月,真宗下诏对锁宿制度做出更加明确的规定,并将锁宿范围扩大到发解试考官。

第六,实施封弥、誊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宋太祖及其继承人对科举制作了上述改革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唐代取士不公的现象。但是,科场舞弊犹如水银泻地,可谓无孔不入。对应试士子尽管有继烛、挟带、传义、替身、冒籍等多种禁令,但考试时仍不免花样百出,而考官厕身场屋,从中高下其手,更是防不胜防。所以,在封弥制尚未建立前,科举条制远不能说已经严密。封弥,也称糊名或弥封,最早出现于唐

①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四之一五至一六。

② 幔亭曾孙:《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一四《屠牛者断罪拆屋》,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535页。

③ 柳开:《河东先生集》卷八《与郑景宗书》,《四部丛刊》本。

④ 《长编》卷一四,开宝六年三月辛酉条,第297页。



代的制举中。^①武后时,又用于吏部试选人上。^②不久,又“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③。五代时,虽曾有官员将糊名应用于科举中,但遭到大官僚、大贵族的反对而被停废。宋代糊名,不仅要糊住(或截去)试卷上应试士人的姓名,也要糊住(或截去)写有乡贯、三代的卷首,这恐怕就是宋人称糊名为封弥的原因。北宋统治者为了杜绝考官在考校和定等中的徇私行为,先后在殿试、省试、州郡发解试和开封府国子监试及别头试中推行弥封。^④科举实行封弥以后,考官虽不能从试卷中看到应试者的姓名,但还是可以根据笔迹及事先商定的密记,将其辨认出来,在评卷中仍可能发生徇私行为。如景德二年正月省试,权三司使刘师道第几道预试,时知制诰陈尧咨为考官,教他在试卷中“刺针眼为识验”。几道擢第后事泄,“诏落几道名籍,永不得预举”^⑤,并责授刘师道为忠武军节度行军司马,陈尧咨为单州团练使。为了纠正这类弊端,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殿试置誊录院,考卷始行誊录,由于考官在定等时看到的已不是真卷,识笔之弊始绝。不久,誊录制也被陆续应用到省试和各类发解试中去。

此外,北宋政府为使西川、山南、荆湖等道举人赶往开封府参加省试,实施“往来给券”的制度。^⑥南宋远地得解举人赴省试时,也能得到国家的资助。绍兴二十七年(1157)五月,中书省曾经下过指挥,陕西州军和西川举人,凡赴省试者,“仍给口券”,从而使远方寒士有条件赴临安府参加省试。

经过改革以后的宋代科举,彻底扫荡了唐代以来科举制度中存在的弊端,成为历史上最为公平的取士制度,故欧阳修对它称赞道:“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各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⑦

如此,才使平民出身的读书人有可能通过科举脱颖而出,从而极大地造就了人才,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

二、宋代科举造就了浙东学人

朱熹有云:“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⑧陆九渊也说:“科举取士久

① 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历代制下》,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357页。

② 《通典》卷一五《选举三·历代制下》,第364页。

③ 《新唐书》卷四五《选举下》,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175页。

④ 参见笔者与徐规先生合撰之《北宋的科举改革与弥封制》,《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⑤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四之一八。

⑥ 王称:《东都事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 《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一一三《论逐路取人札子》,中华书局2001年点校本,第1716页。

⑧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力行》,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第246页。

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也。”^①说明在官僚政治已经完全取代门阀政治,并以重文抑武作为国策的宋代,一个读书人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要显示自己的才能,除了参加科举考试,跻身仕途,取得实现自己抱负的平台以外,已无别的道路可走。因为正如前文所说,宋代科举已为一般平民子弟提供了一个读书做官、尽显才能的机会。这种情况,在唐代是不可想象的。

下面,本文仅以上述列举的六位著名浙东学人之出身为例,说明宋代科举是如何造就了浙东学人。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婺州金华人。其先世居河南,是宋代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大族,可谓累世簪缨,人称东莱吕氏。东莱吕氏最早可追溯到后唐长兴年间(930—933)的九世祖、户部侍郎吕梦奇。梦奇生有两子:长子龟图,居汴京(河南开封),是为南宅始祖;次子龟祥,居寿州(安徽寿县),是为北宅始祖。在北宋,东莱吕氏先后出了三位宰相,他们是蒙正(太宗、真宗朝)、夷简(仁宗朝)、公著(哲宗朝),出任执政的人就更多。^②吕祖谦曾祖好问,出自北宅,好问曾祖夷简,迁汴,为开封人。北宋后期,好问以祖父荫入仕,官至兵部尚书(从二品),“靖康之变”,随高宗南下,绍兴元年(1131),以资政殿学士知宣州、提举洞霄宫致仕,不久即病死桂州(广西桂林)。好问有五子,三子弼中,即祖谦祖。弼中生大器,大器生祖谦。自祖父弼中起,始家金华。弼中官至驾部员外郎(正七品)、大器官至仓部员外郎(正七品),皆以荫补入仕。吕祖谦先以祖荫补将仕郎(低级文散官),隆兴元年(1163),考取进士。不久因母丧去官,在武义明招山开馆教授生徒,“四方之士争趋之”^③。淳熙八年去世,终官著作郎(从七品)、国史院编修。《宋史·吕祖谦传》言:“祖谦之学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献之传。长从林之奇、汪应辰、胡宪游,既又友张栻、朱熹,讲索益精。”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学者称龙川先生。婺州(浙江金华)永康人。曾祖知元,北宋末年,“隶籍武弁”,在金人攻破都城开封时战死。祖父益,曾为太学生,毕生从事举业,却屡试不中,“又欲以武事自奋”,也“弗克如其志”。因怀才不遇,晚年“乃浮沉里闾”^④,整日以饮酒自遣。父次尹,亦不显。以上可知,陈亮祖上当薄有家产,属于中小地主无疑。但到陈亮时,家道已经衰落,因“贫不能自食”,乡人徐某欲将己子托其教导,“而使食焉”。陈亮始则推辞,“其后计穷”^⑤,便公开收徒讲学,成了一个乡先生。陈亮还几次赴太学读书,以期能顺利地考取进士。史言陈亮“为人才气超迈,喜谈兵,论议风生,下笔数千言立就”^⑥。他曾五次上书孝宗,力主抗金,收复北方

① 陆九渊:《象山全集》卷二三《白鹿书院论语讲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参见《东莱文集》卷一四《东莱公家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宋史》卷四三四《吕祖谦传》,第12872页。

④ 《陈亮集》卷三五《先祖府君墓志铭》,中华书局1987年增订本,第458页。

⑤ 《陈亮集》卷三七《徐妇赵氏墓志铭》,第494页。

⑥ 《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第12929页。又,据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七《朱唐交奏本末》载:“……同父游台,尝狎籍妓,嘱唐(仲友)为脱籍。许之。偶郡集,唐语妓云:‘汝果欲从陈官人邪?’妓谢。唐云:‘汝须能忍饥受冻乃可。’妓闻,大恚。”足见陈亮家境之贫寒。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323页。

失地,陈亮声名由此远扬。由于与朱熹、张拭、吕祖谦、叶适等人“相与上下其论”^①,也使陈亮的学术思想不断得到深化。光宗绍熙四年(1193),时陈亮已五十一岁,终于考取进士第一人,初官建康府判官厅公事(从八品)。状元及第,本使陈亮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抱负,不料尚未莅职,即于次年三月病故。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原籍处州(浙江丽水)龙泉,至其祖公济,始迁温州瑞安。父光祖,再迁永嘉,“困于无地,不自振立”^②,只得“聚数童子以自给”,成为一个塾师。母杜氏,间亦从事麻织,以补家用。杜氏出嫁后,连年遭到大水,“室庐什器偕尽,自是连困厄,无常居,随僦辄迁,凡迁二十一所”。“穷居如是二十余年,皆人耳目所未尝见闻者”。^③加之还有兄弟六人和姐妹三人,家庭生活之艰辛,在他未仕前,完全可以想见。叶适自幼聪颖,“十岁能属文”^④。十四岁,入私塾读书,先后得到著名学者陈傅良等人的教诲。后又游学各地,问学于陈亮、吕祖谦等人。二十七岁时,因生活不继,在乐清雁荡山僧舍办村塾授徒谋生,其间又自习举业。孝宗淳熙四年(1177),叶适以翰林学士周必大门客的身份,参加浙东路漕试合格,获得发解。翌年春,遂以进士第二名及第,从此踏上仕途,由初官文林郎(从八品)、镇江府观察推官,步步迁升,终官宝文阁学士(正三品)。

杨简(1141—1226),字敬仲,学者称慈湖先生。先世居天台,后多次迁徙,先后居于宁海、奉化、鄞县等地,绍兴三十一年(1161),又迁居明州慈溪,始为慈人。不过,无论是天台,抑或宁海、奉化、鄞县、慈溪,皆属浙东地区。杨简曾祖、祖父、父亲三代皆不仕,当属平民之家无疑。据记载,其父庭显,“矍矍然儒而果毅,有识量,义所不可,万夫莫回”,是一位倔强而颇有气节的读书人,恐怕也做过塾师。杨简自幼学习勤奋,即便是假日,也“凝静几门如常日课,未尝投足户外”。后入太学,学习成绩优良,“每试辄魁”^⑤。乾道五年(1169)考取进士,授富阳主簿(从九品),会陆九渊道过富阳,两人问答有所契,遂定师弟子之礼。杨简终官宝谟阁学士(正三品),享年86岁,成为陆学在浙东的传人。

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先世居浚仪(河南开封),后迁居庆元府鄞县。父撝,嘉定十六年进士,终官直秘阁(正八品)、知温州。应麟“九岁通《六经》”^⑥,学问该博。理宗淳祐元年(1241)考取进士,宝祐四年(1256),复中博学鸿词科,累迁礼部尚书(从二品)。是南宋大儒真德秀的再传弟子,一生崇奉朱学,著名学者胡三省、戴表元、袁桷皆为其门人。宋亡,隐居不仕,专心著述。一生有著作二十余种,学问精深,尤长于典章制度,在宋元之交的儒家学者中当数第一人,被人誉为“学

① 《陈亮集》卷二九《与张叟侍郎书》,第383页。

② 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一五《致政朝请郎叶公圻志》,中华书局1961年点校本,第292页。

③ 《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二五《母杜氏墓志》,第509页。

④ 《嘉靖温州府志》卷三《人物》。

⑤ 钱时:《慈湖先生行状》,《慈湖遗书·附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宋史》卷四三八《王应麟传》,第12987页。



极天下之博”^①。

黄震(1213—1281),字东发,一字汝震,门人私谥曰文洁先生。南宋庆元府(浙江宁波)慈溪县人。^② 黄氏家族在北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从温州乐清徙居慈溪时,家境尚较富有^③,但似乎无人在朝中做官。为了保持家业,自其曾祖允升起,历经其祖父世尧、叔祖父得一、父亲一鄂先后从事举业,这些人虽薄有文名,却都屡试不第,故至黄震出世时,家道已经衰落。他幼承父教,熟读《四书》《五经》。年长后,一面研究儒学,一面授书糊口。宝祐四年(1256)五月,年已四十四岁的黄震,考取文天祥榜进士,同榜中的陆秀夫、谢枋得、胡三省等人,后来都与文天祥一样,成为著名英雄和抗元志士。时官冗,黄震待阙三年后才踏上仕途。终官直宝谟阁(从七品)。宋亡,归隐四明乡间,继续从事儒学研究,成为朱学在浙东地区的传人。

在浙东,还有如吴芾、王十朋、胡三省一类学人,他们皆出身贫苦,入仕前很少为人所知,但因为考取了进士,虽然没有像吕祖谦、叶适等人那样,形成自己的学派,却分别成为著名的政治家、诗人和学者,他们入仕前后的地位,真可谓有天渊之别。

从以上一些人的简要身世中,人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他们的家世大都不显,有的甚至十分贫穷,但都通过科举踏上了仕进之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成为世人瞩目的对象。

论者或问,为何要踏上仕途方能成为著名学人? 笔者的回答是:在宋代,非进士出身之人在学术上虽然也可能有某些成就,但因为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所以不仅不可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其学术思想和文化成就,也往往因无人注意而湮没不传。叶适之父光祖、吕祖谦之父大器、陈亮之父次尹、杨简之父庭显、黄震之父一鄂,都是文化人,皆从事过举业,不可能在学术上一无成就,但他们却没有一文流传后世,就是一个明证。而叶适等人,因为考取了进士,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所以既可以行其志,其学术思想和文化成就也容易为时人所注重,加之门生众多,更容易获得传播。在这方面,陈亮之言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说:

国家以科举造士,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笔为文。则可屈折以自求达。至若乡间之豪,虽智过万夫,曾不得自齿于程文熟烂之士。及其以智自营,则又为乡间所仇疾,而每每有身挂宪网之忧。向之所谓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卒使造化之功有废置不用之处,此亦为国之一阙。^④

① 方回:《桐江续集》卷三一《应子翱经传蒙求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关于黄震的籍贯,比较复杂,此处采用《宋史》本传的说法。实际上,据《鄞县志》载,震本贯定海(浙江镇海),后徙于慈溪(今属浙江),晚年复居定海泽山。入元,又先后侨居鄞县(今属浙江)之南湖、桓溪、同谷等地。故黄震时称自己为鄞人(如《黄氏日抄》卷八六《梅溪记》《积庆庵记》等篇,皆谓“鄞黄震记”),时而又称自己为慈溪人(如《黄氏日抄》卷八六《宝善堂记》《广德军沧河浮桥记》等篇,皆作“慈溪黄震记”。)

③ 《黄氏日抄》卷九五《祭叔祖机察壶隐先生墓》载:“在昔先人,来从东嘉,富而好德,朴不务华。迨我叔祖,始以文振。”按:东嘉乃温州之别称。

④ 《陈亮集》卷三四《东阳郭德麟哀辞》,第457页。